

王冠楠◎著

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及其 非对称性研究

中美竞合关系的动态演进折射出深层次的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
本书对中国在这一关系中的敏感性、脆弱性以及这一关系本身的非对称性进行解读和分析

王冠楠◎著

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及其 非对称性研究

Research on Sino-U.S.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ts Asymmetr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及其非对称性研究 / 王冠楠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5

ISBN 978 - 7 - 5201 - 2742 - 4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中美关系 - 国际经济关系 - 研究 IV. ①F125.5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84658 号

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及其非对称性研究

著 者 / 王冠楠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王玉山

责任编辑 / 王玉山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济与管理分社 (010) 5936722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35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2742 - 4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出版

(编号: 2017M621196)

序

美国与中国之间贸易关系的开端，可以追溯到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不久即 1784 年 2 月 22 日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从纽约起航开往中国广州的航程。这艘 360 吨的商船横渡大西洋，绕过好望角，经印度洋和太平洋，于同年 8 月 23 日抵达广州黄埔港。“中国皇后号”装载了 40 多吨皮货、人参等美国土特产，在广州受到“十三行”的欢迎。该船在 4 个月后返航时装载了茶叶、瓷器、丝织品、漆器、南京紫花布和福建的肉桂，其首航的成功在美国引起了轰动，来自中国的货物被抢购一空（据说连华盛顿这位国父本人也专程去购买了一只绘有飞龙图案的茶壶）。这次航行为船主带来了 3 万美元的利润。当时美国国会议员们兴奋地认为：“对中国的贸易可能为美国开辟一条巨大的发财之路。”两年后，美国国会正式任命在“中国皇后号”负责贸易事务的 Samuel Shaw（山茂召）为美国第一位驻广州领事。据史料记载，到达广州的第二艘和第三艘美国商船分别为“希望号”和“大突厥号”。不久以后，一家名为“广元行”的美国商行在珠江边的夷馆区开业。1789 年和 1791 年，美国国会两次通过对华贸易特惠法案，由此证明了早期的美中民间贸易受到了美国政府的重视。美国很快就超过法国、荷兰以及葡萄牙等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对华贸易第二大国（据统计，在 1786 ~ 1833 年这一期间，美国来华的商船达到 1004 艘）。从总体上看，直到中英鸦片战争之前，中美双边贸易

基本上是平等互利的，是纯粹的商业关系。相比较而言，美国商人比其他列强更守法和更友善，因此更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在华的美资洋行生生灭灭，拆分重组，形成了以“旗昌洋行”（Russell & Co.）占主导地位（根据 1829 年的统计，当时该洋行占美中贸易的 50%）和“同孚洋行”（Olyphant & Co.）独树一帜（该洋行是美国对华贸易商中唯一不参与鸦片贸易的洋行）的格局。1844 年的中美《望厦条约》作为中美两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确保了美国在对华贸易上保有与其他列强均等的权利；而最惠国待遇则是该条约中最重要的内容，它使美国在当时的对华贸易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据统计，1860 年美中双边贸易总额从 1845 年的 900 万美元增长为 2300 万美元。到 1905 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总额已经超过 1 亿海关两。美国成为近代以来对中国产生最大影响的三个国家之一。

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双边贸易是中美经济关系的主要形式。尽管当时中国对外国投资的大门已经打开，但是美国企业对华投资的规模较小，且主要是美国私人企业的投资。如在 1902 年仅为 1750 万美元（而同年英国的对华投资已经超过 1.5 亿美元）。此后，在“门户开放、利益均沾”以及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促进下，美国的对华投资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 4930 万美元增长为 1931 年的 1.55 亿美元（但是依然远远低于同年英国的 9.63 亿美元和日本的 9.12 亿美元）。尽管如此，中美经济关系在 1927 ~ 1937 年这一期间已经成为南京政府对外经济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审视中美经济关系的过去，是为了更加看清现在和未来。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中美两国在几乎没有任何经济、社会以及文化交往的情况下，从各自的安全战略需求出发，开始实现双边关系的正常化。1978 年底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与中美关系的决定性进展，则构成了中国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自以中美建交和邓小平访问美国开始的 1979 年起，双边经济关系作为整个中美关系的核心以及“压舱石”和稳定器迅速发展。特别是中国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美国国会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地位，在政治与经济之间筑起了一道防火墙，中美双边经济关系从此被置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之中，并且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经济关系之一（同时也是当今世界最复杂的双边经济关系）。2008年爆发的这场被经济学家称为“改变未来的金融危机”以及它所带来的影响，使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中美两国作为全球经济体系中最具系统重要性的大国，其相互依赖关系的发展模式对全球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全球经济中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无法解决。同样，中美两国的经济和金融在事实上也是相互影响的，其中任何一个国家在把握其经济和金融运行时都无法脱离对方。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国家的经济关系比中美两国更加紧密。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的观点，中美两国在许多重要方面已经成为对方的镜像：终极生产者（中国）是终极消费者（美国）的镜像，而储蓄盈余者（中国）又是储蓄赤字者（美国）的镜像。因此，进入21世纪以来，相互依赖的中美经济关系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值得关注的是，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新兴大国的中国经济和作为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守成大国的美国经济都处于极度失衡的状态，因此二者都面临着经济发展的瓶颈和经济结构转型的挑战；而深度融合和严重失衡又构成了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美经济关系的最主要特征，并且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王冠楠博士在本书中基于对“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是密切相关的即经济联动模式与权力结构分配之间必然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客观规律”这一认识，运用理论分析与经验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开放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两国的联动模型；并且揭示了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在DSGE模型框架下的主要表现。在此基础上，从贸易和金融两个维度，对中国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

进行了考察；并且运用经济学分析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了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中的脆弱性及其非对称性形成的来源与基础；同时引入经济“暗物质”假说，即美国对外负债规模的存量调整方式，进一步证明了美元的“过度特权”的存在。作者在书中不仅揭示了中美两国之间非对称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是“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一种典型模式；而且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和论证了中美两国应该如何通过加强双边经济和金融合作使这种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得以改善，特别是从“消极依赖”转变为“积极依赖”，即中国如何从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固化的投资驱动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走出来。

我认为，王冠楠博士的这项研究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相对于以往从表现和后果上研究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诸多研究，本书突出了通过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对中美经济相互依赖进行研究的方法，对中国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进行了阐述；特别是进一步从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分析中指出非对称性的来源和基础，对中美两国的权力结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而将有关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研究推进了一步。第二，本书对美国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所提出的“中美两大经济体必须实现从消极依赖到积极依赖的转变”这一重要论点进行了拓展，同时对他所提出的“消极依赖”和“积极依赖”这两个名词的含义进行了阐释；特别是在此基础上，对实现这种转变的动力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从国际经济学的视角看，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美两国都受益于经济上的这种深度的相互依赖。在贸易领域，中国通过美元融入了全球价值链，从而成为美元本位制的最主要的受益者（但同时也成为该体系的最主要的支撑者）。但是双边贸易的严重失衡，却成为美国政府特别是部分美国国会议员和相关利益集团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向中国施压的“理由”。在金融领域，中美两国的金融关系是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博弈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博弈是一种

“金融恐怖平衡”)。这种博弈不是简单的静态博弈,而是动态博弈。这种竞争合作关系不仅将长期存在,而且是一种动态的互动。在投资领域,中美双边投资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甚至比双边贸易更为重要(因为中国扩大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可以平衡双边贸易关系的失衡)。然而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接受外资最多的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却出乎意料地少,而且至今还没有一个可用于规范双边投资关系的双边投资协定。据此可以认为,中美经济关系研究是一个开放的课题或研究领域。这里有许多问题需要而且值得我们去进行不懈的探索。

十一年前,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柏林自由大学教授莫里茨·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大声疾呼国际社会关注中美两国密不可分的现状,并且提醒世人关注中美经济之间“共生”关系的不断加深及其对全球经济格局的重要意义。弗格森和舒拉里克试图用“Chimerica”(“中美国”)这一新的地缘政治名词证明,由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与美国的过度消费模式的合二为一所形成的世界经济秩序以及中美两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然而弗格森和舒拉里克在2011年发表的题为《“中美国”的终结》(*The End of Chimerica*)一文中认为:过去十年里中美两国的“经济联姻”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已经“濒于破裂”,“中美国”这一形式不能长久,其解体是不可避免的。相较于弗格森和舒拉里克在短短的几年里先后提出的大相径庭的观点,我更赞同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所提出的“美中两国的关系是共同演进(co-evolution)的关系”这一观点。这是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包括双边经济关系在内的整个中美关系都已经呈现“难舍难分”之势;合作共赢应该而且必须是中美两国的“宿命”。

国际经济学研究应该包括三个维度,即历史、逻辑以及数据。如果以这个“标准”来判断王冠楠博士的这项研究,我认为,除了历史这个维度的研究相对薄弱一点以外,其余两个维度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功力和深度。作为她攻读博士学位的导师,我为她能够在短短的三

年里在《当代亚太》、《国际金融研究》以及《世界经济研究》等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六篇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论文，特别是其博士学位论文被评为“吉林大学 2016 年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和“2017 年吉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而感到欣慰；并期待她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不断进取。

是为序。

项卫星

2018 年 4 月于吉林大学中心校区

摘 要

中美两国作为当今全球经济体系中最具系统重要性的大国，其双边经济关系需要放置在一个更宽泛的全球和历史背景中加以分析。中美贸易相互依赖依托于全球价值链而形成，中美金融相互依赖则围绕着人民币对美元的货币依赖而展开。那么，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推动国际社会呼吁重建全球经济秩序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厘清中美之间的这种由一个国家负责出口和储蓄，而由另一个国家负责进口和消费的依赖方式是否合理而且是否可持续？更为重要的是，如同过去十几年里中美经济关系的迅速发展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塑造一样，今后两国经济关系中的竞争与合作仍将对全球经济的发展轨迹产生重要影响。那么，在后危机时代，特别是在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后，中美两国之间能否继续开展经济上的良性互动与合作？依赖关系产生权力关系，中国又将如何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中创造和施展影响力？这些问题构成了本书的逻辑起点。

首先，本研究运用实证方法，从贸易和金融两个维度，对中国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进行了考察。在贸易领域，这种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主要表现为中美两国都互为对方重要的出口目的地和进口来源地。在以全球价值链为核心的贸易形态下，中美双边贸易的失衡主要表现为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不同的位置，以及中国处于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加工贸易产业链的终端。由于中美贸

易的相互依赖关系依托于全球价值链而形成，因此，中国与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不同角色和地位，构成了驱动双边贸易关系发展和演变的关键因素：美国对中国中间品市场的贸易依赖受到中国加工贸易模式的影响；而中国对美国最终商品市场的依赖受到美国进口消费能力的影响。在金融领域，中美金融相互依赖关系主要围绕着人民币对美元的货币依赖而展开。这种相互依赖的具体形式，存在于两国的双边资本循环之中。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主要是官方外汇储备，而美国对中国的投资主要来自其跨国公司。这一投资结构上的差异，与两国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市场运行规则的差异密切相关。至于中美两国在证券投资领域的资本依存度远远高于在直接投资领域的资本依存度，其背后的逻辑则主要表现为：第一，中国将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债券市场构成了中国吸引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重要前提；第二，这种双边资本循环的特征来源于中美两国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巨大差异，即中国欠发达的金融体系难以促进国内形成有效的资本积累，而只能通过美国金融市场发达的国际金融中介功能完成本国的资本积累过程。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密切程度，决定了美国经济衰退对中国造成的外部冲击是通过接触性传染，即明确的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进行传播的。在贸易领域，从直接渠道的视角来看，美国的个人收入水平与个人消费水平对于中美进出口贸易存在显著影响，说明美国对华外部冲击的溢出效应集中在收入效应上，美国宏观经济条件的恶化对于中国出口市场而言，是最为重大的威胁。从间接渠道的视角来看，美国对华外部冲击的溢出效应来源于它对亚洲生产网络的影响。中国对美出口贸易在美国宏观经济下行时反应迅速，几乎所有类型的贸易商品都受到了冲击；但是从贸易恢复的角度来看，中国对美出口贸易的恢复能力非常强劲，甚至高于美国国内宏观经济的复苏水平。在金融领域，美国通过金融渠道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第二，美国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对海外资金的重新分配。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对美国的贸

易依赖与中美金融相互依赖关系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中国国内金融市场发展的滞后以及对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过度依靠,使中国陷入一种对外部冲击反应过度敏感的对外开放模式之中。

其次,本研究运用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了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中非对称性形成的来源与基础,分析了这种非对称性对两国权力结构的影响。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背后的“金融恐怖平衡”与“债务人逻辑”,是分析中国经济脆弱性的概念基础。其中,“金融恐怖平衡”揭示了中国在美国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行为,实际上是确保本国美元资产与出口战略实施的无奈之举,并由此引发了中国货币当局在政策选择上面临的两难困境。中国与美国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影响着两国在经济分工格局中的位置,从而也进一步影响着两国在“金融恐怖平衡”背景下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演进趋势,即中国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外围国家”或“贸易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资本循环很难绕过“美元陷阱”和“斯蒂格利茨怪圈”。至于主导现行国际金融规则的“债务人逻辑”,则揭示了中国在美元本位制下,陷入美元体系越深,就越会受到“路径依赖”效应的影响。对中国而言,美元体系作为制度层面上可替代性极低的“国际商品”,在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中是至关重要的“投入要素”;这一“投入要素”的缺失将使整个经济遭受巨大的损失。中国不具备获得替代选择的能力这一点,是中国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脆弱性的最本质体现。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中国的脆弱性体现为无法以较小的代价摆脱对美国的市场依赖与货币依赖,即中国难以承担改变这一依赖框架必须付出的成本。这种脆弱性的形成与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背后的“金融恐怖平衡”与“债务人逻辑”等问题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对美元本位制的过度依赖是引发这种脆弱性加剧的根本原因。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中美两国之间的非对称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是“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一种典型模式。

从总体上看，中国对美国的商品依赖和金融依赖远远超过美国对中国的商品依赖和金融依赖。货币金融霸权（即由美元本位制所支撑的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结构中的核心。在美元本位制的框架下，中国的崛起与其他新兴大国一样，在本质上都是美国霸权主导的“系统内的地位提升”。为此，承认并支撑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是中国融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必然选择。美国所建立的美元体系使其部分地与外围国家分享了经济增长尤其是贸易发展方面的权力，即所谓的“权力扩散”。中美两国的非对称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影响着美国对中国权力扩散的模式，从而影响着两国之间的权力划分的现状。中国在融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之时，凭借本国丰裕的劳动力资源占据了全球生产网络的一端，从而在参与亚太地区事务时也逐渐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而美国在允许一部分权力向中国扩散的同时，也在特定领域里遏制了中国对其他合理权力的争取。如果说“权力”是对事件过程和结果的控制，那么美国只允许别国参与到国际事务的过程之中，而自己却始终保持对各类事务的执行结果的高度控制。就共同利益而言，中美两国在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上的相互依赖关系，使两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利益交集：中美两国的宏观经济气候依然以正向相关为主；但是在利益交集的基础上，美国则凭借美元霸权和由此形成的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占有了更大的利益份额。在不对称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格局下，美国将有能力继续谋取不对等的利益划分。也正是为了维护这种不对等的利益，美国在对华政策上试图尽可能地维持这种非对称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然而，相比于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美国更多的是从影响力的角度维持这种非对称性。在两国竞争和角力的新焦点中，网络安全问题和亚太地区再平衡问题日趋突出。当然，日趋紧密的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的汇率政治形成了制约，充分证明了美国作为非对称依赖较小的一方，不能完全通过经济手段将经济影响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进而对依赖较大的一方（即中国）形成权力。

最后,本书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和论证了中美两国应该如何通过加强双边经济和金融合作,使这种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得以改善,特别是从“消极依赖”转变为“积极依赖”。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对于确保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顺利与否,在很大程度上首先取决于中美两国彼此之间能否正确定位。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利益既存在冲突性,又存在明显的互补性与共生性。全球金融危机后中美两国围绕新型大国经济关系建设的博弈,与两国经济结构失衡的调整密切相关。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既存在一定的战略竞争,又能在一定范围内实现较为稳定的合作。在这个竞争与合作的过程中,无论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还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实质性进展,都将发挥关键性的作用。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中美两国在制度与政策协调的过程中做出长期而持续的努力。

本研究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相对于既有的主要从表象和后果上研究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成果,本研究突出了利用DSGE模型对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进行研究的方法,对中国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脆弱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且进一步从非对称性的视角,对中美两国的权力结构进行了分析,从而将有关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研究推进了一步。第二,本研究对美国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所提出的“中美两大经济体必须实现从消极依赖到积极依赖的转变”这一重要观点进行了拓展,即对他所提出的“消极依赖”和“积极依赖”这两个名词的含义进行了阐释,在此基础上,对实现这种转变的动力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Abstract

The bilateral econo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o are the most systemically important countries in the global economic system, needs to be analyzed in a broader glob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The Sino – U. S. trade interdependence relies o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d the Sino – U. S. financial interdependence unfolds as Chinese yuan mainly pegged to U. S. dollar. So,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alling for a reconstruction of global economic order after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China needs to clarify whether the interdependent mo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sustainable or not. More importantly, as in the past decade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ino – U. S.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has shaped the world economic landscape, th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is bilateral economic relationship in the future will continue to influence the evolu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refore, in the post-crisis era, especially when China has replaced Japan as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will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 Dependency produces power dominant relations, and then how will China establish and exert its influence in this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These questions constitute the logic starting point of this book.

In the framework of DSGE model,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is mainly determined by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the individual country. The change of the counterparty's economic policy will weaken the traditional

macroeconomic policy's influence on domestic economic variables, so changes of one country's economic policy would be a non-ignorable disturbance to another country. The large "marginal effect of foreign income to net export" of China makes China's export highly depend on the final goods consumption market in the United States; Meanwhile, The small "marginal impact of interest rates on the foreign bond holdings" makes the fiscal policy and the regulation effectiveness of monetary policy of China to b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currency market environment change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trade and capital circulation pattern between those two countries determines the sensitivity and vulnerability of China to b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is also the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of the asymmetry of the interdependence.

In the field of trade, the two countries are viewing each other as the most important export target and import source. The imbalance of the Sino - U. S. bilateral trade manifests as their different positions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with China being the terminal of processing industry chain in the East Asian production network.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the specific form of the interdependence exists in the bilateral capital circulation. The investment from China to the United States comes mainly from official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while the investmen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China mainly comes from the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The differenc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ifferent pattern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varying rules of market operation of those two countries. More importantly, there is internal connection between financial and trade interdependence. Lagging development of the domestic financial market in China and excessive reliance on the role of net exports to economy growth has made China oversensitive to external shocks from the outside world.

Behind the Sino - U. S.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financial balance of terror" and the "debtor logic", are fundamental concepts to analyze the economic vulnerability of China. The "financial balance of terror" reveals that China's investment behaviors in the U. S. financial markets are intended to ensure the value of own national U. S. dollar assets and the